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4 期
2003 年 6 月，頁 159～178
本文 2003.5.15 收稿，2003.6.13 通過刊登

《漢書》〈蘇武傳〉於《平家物語》與《今昔物語集》中的轉化意義

楊錦昌*

摘　要

本研究試圖兼顧傳統與創新，將研究對象置於能夠與《漢書》〈蘇武傳〉對應的《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和原典《漢書》〈李廣蘇建列傳〉上，透過三部作品的平行呈現及相互對應，探討其中的作品意義及敘述風貌，同時檢視作品轉化的文本策略及作者意圖。而《漢書》〈李廣蘇建列傳〉的單一呈現及其研究成果，將作爲中日比較研究的符碼（code）。透過這些符碼（code）檢視《平家物語》與《今昔物語集》的轉化情形和文本意義及策略。如此應該能夠避免單純的影響考證研究。

關鍵詞：漢書李廣蘇建列傳、蘇武傳、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符碼

*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Transformed Meaningfulness in *Han Shu, Shu Wu Chuan*, *Hekeimonogatari, Konjyakumonogatari*

Yang, Chin-c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secure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targets of this research are placed on *Heikemonogatari, Konzyakumonogatarishu* and *Han Shu, Li Kuang Su Chien Lien Chaun*, those three works can be seen together with *Han Shu, Su Wu Chaun*. The meaningfulness and the narrative style are discussed through the parallel representation. The textual strategy and author intention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are also inspec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imple representation of *Han Shu* are treated as the codes in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textual meaningfulness and strategy of *Heikemonogatari* and *Konzyakumonogatarishu* inspected throught these codes can avoid the impact of previous academic studies.

Key words: *Han Shu, Li Kuang Su Chien Lien Chaun, Su Wu Chaun Heikemonogatari, Konzyakumonogatarishu,* code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e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における『漢書』「蘇武伝」の変容

楊錦昌*

要　旨

本論は、『漢書』「蘇武伝」の文芸の作品の中での継承と創造の二つの流れを視野に入れつつ、『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李広蘇建列伝」上の三作品を対象としてパラレルに「蘇武伝」を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の三つの作品を並べて、その相互の対応を見ることにより、それぞれの作品の意義や叙述の態度を考察し、作品変容の底流にある本文ストラテジーや編者の意図を検証する。また、『漢書』「李広蘇建列伝」を単独で検証する中で、中日比較研究のコードを抽出し、そのコードを通して、『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の変容の諸相と本文ストラテジーや意義を究明、単なる影響関係に終始しないように努める。

キーワード：漢書李広蘇建列伝、蘇武伝、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コード

* 輔仁大学日本語文学系助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書》〈蘇武傳〉於《平家物語》與《今昔物語集》中的轉化意義

楊錦昌

一、前言

眾所皆知，中日兩國由於地緣關係，人民往來頻繁，文化交流興盛，彼此互爲影響的跡象隨處可見，文學作品更是其主要代表。日本上古至近世的文學作品中，或多或少都隱含著一股「漢味」，而軍記物語代表作《平家物語》與說話文學名著《今昔物語集》自不例外，其內容不但深受儒釋影響，就連文體亦難幸免，形成「和、漢混交」的獨特現象，間接提昇作品濃厚的漢學氣息。因此，就比較研究而言，自然容易流於單純的影響考證研究。

「日本比較文學會」於昭和 23 年（1948 年）成立之初，的確較側重法國派的影響考證研究。而昭和 30 年（1955 年）左右，中島健藏及太田三郎的比較文學著作出版、日本比較文學會會報創刊（日本東北支部的設立）、學會刊物《比較文學》創刊及加盟 ICLA 國際比較文學會（1958 年）等事件活絡了日本比較文學界，不過於國際化的過程中，卻因研究方法的差異而陷入法國派與美國派的紛爭。然而，若從現今「日本比較文學會」會則[1]第 2 章第 4 條（目的）及第 5 條（事業）來看，目前的研究方向多朝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進行，研究對象也較偏重近代文學，且跨國研究與交流更是其推動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活化日本古典與漢語文化圈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日本學界於昭和 58 年 10 月（1983 年）成立「和漢比較文學會」[2]。該學會明確指出研究方向與範疇，使中日（和漢）比較文學重新受到定位，並賦予較新、較廣的研究領域，也擺脫掉單純的影響考證研究。

[1] 請參照「日本比較文學會」網頁：http://wwwsoc.nii.ac.jp/jcla/index.html
[2] 請參照「和漢比較文學會」網頁：http://fan.shinshu-u.ac.jp/~wakan/aisatu.htm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者，近年來，西方文學理論盛行，幾乎到達席捲全球，影響各研究領域生態的地步。不可否認地，於比較文學的領域上，它的確提供不少研究方法與理論，間接擴大一些研究觸角，然而卻也造成另一波的比較文學危機。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兼顧傳統與創新，將研究對象置於能夠與《漢書》〈蘇武傳〉對應的《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和原典《漢書》〈李廣蘇建列傳〉上，透過三部作品的平行呈現及相互對應，探討其中的作品意義及敘述風貌，同時檢視作品轉化的文本策略及作者意圖。而《漢書》〈李廣蘇建列傳〉的單一呈現及其研究成果，將作爲中日比較研究的符碼（code）。透過這些符碼（code）檢視《平家物語》與《今昔物語集》的轉化情形和文本意義及策略。如此應該能夠避免單純的影響考證研究。

二、《漢書》

《漢書》〈李廣蘇建列傳〉乃結合李廣傳、李陵傳及蘇武傳而成一完整篇章。其中，〈蘇武傳〉由於結構完整，教化性強，因此，廣汎地流傳於中國本土與鄰國日本。日本更以「說話」[3]形式轉化到《今昔物語集》及《平家物語》等作品。如前所述，於探討這三部作品間的相互對應關係及意義前，似乎有必要先行探討原典〈李廣蘇建列傳〉〈蘇武傳〉，藉此求取作者意圖、作品主題及文本意象。並且，以此作爲考究符碼，以期呈現《漢書》與《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的文本差異程度及其轉化情形與意義。此外，試圖歸納相關文類，爲三部作品的文學特質作一檢視與定位。

《漢書》〈蘇武傳〉之內容梗概，簡述如下：

> 天漢元年，蘇武奉漢武帝之命，出使匈奴，然因隨從張勝支持虞常謀反單于行動，不幸事跡敗露，蘇武慘遭池魚之殃，受困北海十九年。其間，單于數次招降，蘇武均秉忠誠節操，不為所動。昭帝年間，漢奴議和，隨從常惠獻計，蘇武始得返回漢室。

[3] 說話意指古代故事、傳說及民間故事等口誦文藝，屬於集體創作的文藝表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篇令人動容之處，莫過於蘇武的人物形塑。其中，數次的招降行動，更深切地刻劃出蘇武的人物造型及其所追尋（QUEST）的「忠義誠信」情操。此情操不僅是作品的主題，同時亦是作者的訴求。且讓我們進入《漢書》〈李廣蘇建列傳〉的作品世界，看看作者如何藉由招降行動，爲蘇武塑身造型。

單于使衛律招降蘇武，蘇武言行並進登場，先行向隨從常惠道：「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漢～2461）[4]，隨即「引配刀自刺」（漢～2461），表現出「寧可犧牲，不可偷生」的英勇行徑。正當蘇武引刀自刃之際，作品特別詳細描述勸降使者衛律的神情及行動：「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五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漢～2461）對此，作品藉由短短數語，表現出面臨危急之際時的時間緊湊，令讀者迅速融入作品世界裡，同時也在不自覺當中受到主角人物的行爲感動。另外，班固將在場的親近隨從常惠的反應，輕描淡寫地輕輕帶過，反而將敵方使者衛律的「驚」「慌」「急」「行」「動」等神情、行動，做出生動且詳盡的描述。這些是否爲史實，目前無法得知，然作者以反方的行動凸顯蘇武志節的手法及意圖應是清晰可見。同樣的手法及意圖亦表現在單于的反應上：「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漢～2461）。至此，第一次招降行動無疾而終。

而第二次的招降行動，乃以高壓、懷柔並進。作品一方面運用蘇武面對虞常問斬仍無懼態的手法，刻意強調蘇武的不屈精神。另一方面，藉由衛律舉劍欲殺張勝的情節對照表現，意圖襯托蘇武的忠勇志節。文本當中，體現在衛律與蘇武間的言語及心理對峙表現：「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課，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漢～2462）。自知高壓、威脅手段無法如願招降蘇武，衛律改行懷柔、利誘手段進行。

> 「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

[4] （漢～2461）代表《漢書》(宏業書局、民國 81 年 4 月)第 2461 頁。以下適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思義，畔主背親，為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使矣。』」（漢~2464）

此段對話表現手法採用由靜「律曰；武不應」而動「律曰；武罵律曰」，爲「暴風雨前的寧靜」留下伏筆。換言之，作品透過蘇武之口，直接撻伐衛律賣國求榮行徑，同時也正式爲忠義誠信及以漢朝爲中心的夷狄觀念定義。當然，作品目的是在不離主題的情況下，再次肯定蘇武忠君愛國的行徑，同時也透露出作者的史觀。畢竟，班固修《漢書》的目的、立場及所欲呈現的歷史現象絕對異於司馬遷的《史記》[5]，由於其受命於東漢明帝修漢書，主要是以帝王之家爲修史中樞，立場當然立於朝廷，教化忠信誠義及夷狄觀念自然優先列入考量。

總之，從衛律的二次招降行動中可見，作者一方面藉用反方及旁人反應的敘述手法凸顯蘇武忠勇的特質，另一方面又採用與蘇武同體的敘述表現，巧妙地表露自我史觀及作品主題。此種表現手法及意圖是否持續運用於第三次的招降行動？此回登場的正是李廣之孫李陵，其於蘇武持節赴匈奴隔年投降匈奴，由於於心有愧，而遲遲不敢面對蘇武。作品中安排李陵登場的目的，應該是要呼應前二次招降行動。換言之，目的是要呈現降將不忠對照蘇武堅貞志節的寫作手法及意圖。然而，李陵與蘇武平素私交甚篤，作品中的招降描述手法當然異於前二次的威脅利誘，其採用報鄉音、談人生的敘述手法，向久別重逢的友人蘇武訴說別後種種，希望藉此喚起友人的認同及感動。陵謂武曰：

「…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劾大不敬，伏劍自刎，……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

[5] 根據李威熊著《漢書導讀》（中史哲出版社、民國 66 年 4 月）：「儒家的主要精神在於尊崇理智，倡導忠孝仁義，班固撰寫漢書，其精神即以此爲依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勿復有云。」（漢~2464）

這段託李陵之口，道出蘇武家人遭遇不測的情形，以及強調「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的話語，令人感到似曾相識，彷彿是道出李陵自身遭受的種種不幸。此乃作品中的李陵，藉此招降時機，將當初武帝遣人掘其祖墳，殺其老母，迫使其不得歸漢的心聲加以表露。而這看似李陵心聲，但從作者和作品同體敘述表現手法來看，應該是班固以含蓄的方式爲李陵辯護的象徵。眾所皆知，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曾提及其爲李陵辯護下獄的事蹟，此前車之鑑或當影響班固編史的態度[6]。司馬遷的仗義執言引來牢獄之災，受皇帝之命編修《漢書》的班固豈不引以爲鑑？因此，縱使其欲抱持司馬遷般史觀，有意爲李陵辯護，但爲避免惹來殺身之禍，終究得顧忌朝廷，而採用委婉含蓄的表現。此般顧忌亦表現在〈李廣蘇建傳〉的贊語中。贊以正面口吻評定李廣與蘇武，然對李陵卻幾乎未作任何論定，只於贊李廣之後提及：「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王其宗，哀哉！」(漢～2469)。勉強說來，此贊語只是避重就輕地略作負面評論而已！由此可知，政治已無形干預到班固修史立場！

班固爲兼顧不著痕跡地爲李陵辯護與持續讚誦蘇武志節，於是，接著又透過蘇武，將其對李陵言論的反應，直接向李陵訴說：「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願當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原勿復再言。」（漢～2464）此段話語中形塑出非凡、偉大的蘇武，其侍君之忠、待國之誠，超乎親族。其遭遇和李陵相同，親族曾受朝廷之害，然其著眼大我，顯然是和李陵側重小我對照。如此安排並非表示班固欲藉此嘲諷李陵叛國，相反地，應該是欲假此對照類比手法，貫穿蘇武的忠誠節操表現。此一貫敘述手法及意圖亦表現於蘇武回應李陵再度勸降時的話語上：「自己已死久矣？王必欲降

[6] 參照注四〈司馬遷傳〉第 32〈報任少卿書〉，其中詳述司馬遷爲李陵辯論，終得牢獄之災的情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漢～2464）不但如此，作者又以李陵的贊嘆：「嗟呼，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漢～2465）襯托蘇武的忠誠仁義，強調其幾可上通於天，下達於地，實非常人可與比擬。當然這也爲蘇武的人物造型作一圓滿結語。

縱觀李陵與衛律的招降行動，依然清楚可見作者的敘述手法和意圖。兩者皆採類比手法，利用反方（招降者）和正方（蘇武）的言行對照，襯托蘇武的忠勇造型及不斷追尋(QUEST) 忠義誠信的目標。而忠義誠信正是文本的主題，亦是作品容易流動的符碼。此外，作者一方面含蓄地展現自我史觀，另一方面又巧妙地爲李陵辯護，此手法及意圖也直接反映在數次的招降行動中。

再者，本作品另一引人注目之處，乃是有關「貴種」[7]蘇武「流離」匈奴十九年，歷盡困頓、折磨後，終得返回國門的敘事結構。若以文類層面來看，此敘事結構應可歸爲日本文學中的「貴種流離譚」[8]之文類上。所謂「貴種流離譚」，意指權貴正派之人流放異地，遠離家鄉，經過長時間的堅苦折磨，終於返抵家門的故事型態。此種故事型態多見於世界文學中，日本文學中的《源氏物語》《伊勢物語》《竹取物語》及羽衣傳說屬之；西洋文學中有關奧狄賽、伊底帕斯及哈姆雷特[9]的敘事記載亦可視爲此文類之代表。此文類特色是，主角於流放之際，面臨諸多「限界狀況」，以此作爲人生試練。所謂「限界狀況」，意指人的一生中，面臨無法以人力改變及避免的情境，換言之，即面臨無法逃脫的絕境。簡而言之，死亡、苦惱、爭論、罪責均屬「限界狀況」。《漢書》〈蘇武傳〉中的蘇武即遭遇不少「限界狀況」。作者藉虞常招供出張勝支持謀反意向，令單于勃然大怒而下令欲殺蘇武等人，因而使「貴種」蘇武陷入第一次的「限界狀況」。此次的敘述策略乃爲呼應蘇武追尋忠勇的主題。而第二次的「限界狀況」出現於衛律二次招降

7 「貴種」多指尊貴之人。本論定位在權貴正派之人，將蘇武歸爲「貴種」。

8 「貴種流離譚」以日本民俗學家折口信夫（Orikuchishinobu）的論調較受矚目。

9 奧狄賽（Oddyssey）是古希臘史詩作家荷馬（Homer）的敘事詩。伊底帕斯（Oedipus）是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劇本中的人物，而伊底帕斯王的作者是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之一的沙弗克力斯(Sophocles)。哈姆雷特（Hamlet）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戲劇，英國文藝復興末期的作品。

國家圖書館 學術期刊資料庫

蘇武失敗後。此次，單于利用高壓手段，將蘇武幽禁於大鉗之中，不予飲食。之後，又將其置於北海無人之處，使其牧羝，羝乳始允返國。遭此命運不但令蘇武陷入極度的「限界狀況」，同時也爲其展開「貴種流離」的困厄生涯。如此逆境，蘇武依舊坦然承受，除發揮其求生本能和高度智慧外，並隨時以忠君愛國砥礪己身。例如：「掘野鼠中實而食之。」「仗節牧羊，臥起操，節旄盡落。」（漢～2463）文中之「節」，乃武帝所賜，做臥起居至旄毛盡落仍片刻不離。此描述爲隱喻蘇武不忘漢室，堅持內心追尋（QUEST）的節操。渡過「限界狀況」後，雖略見轉機：「單于弟於靬王戈射海上。武能紡線，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漢～2463)然好景不常，丁令族人盜走牛羊，「貴種」蘇武又再度面臨困厄的「限界狀況」。作品安排高潮迭起，波濤洶湧，起伏不定，一波流離困頓，接著一波轉機生息，引人入勝。

由上述「貴種流離譚」的文類表現中，導引出「限界狀況」的敘述情境，其目的無他，乃是爲凸顯蘇武所追尋的作品主題－－忠義誠信。

昭帝繼武帝後即位，不數年便與匈奴和親。如此結果爲「貴種流離譚」文類留下圓滿結局的伏筆。之後，由於蘇武隨從常惠爲獻「權宜計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漢～2466）夜訪漢使，使蘇武方得歸國。此「權宜計謀」爲「貴種流離譚」圓滿結局的中心，亦是流動及轉嫁到日本文學的關鍵符碼。

計謀當中提及「雁」，若從「雁」的象徵意義（信、禮、節、智四德及鄉愁）及一貫的習性（終身守著固定配偶，縱有喪偶，亦不再配對，甚至殉情。）[10]考量，情況似乎與蘇武流離北海，一心追求忠君愛國情操，一意感念漢朝社稷的思鄉情懷相當。而此堅持忠臣不仕二君的志節乃是作品主題之一，由此主題不難讓我們對作者意圖及文本策略有較深入的了解。「權宜計謀」中不以其他飛禽走獸呈現，而以「雁」爲帛書的傳遞工具，其目的應該是取用「雁」的象徵意義及其一貫習性。因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貫穿〈蘇武傳〉的忠義誠信及望鄉主題。

[10] 林伯亭〈宋人畫雁之美〉(《故宮文物月刊》5 卷 8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合以上分析或可了解作品主題、表現手法及作者意圖。然而，若將〈蘇武傳〉中的文本敘事結構套用幾個文學用語重新呈現的話，或可簡單歸納爲：

> 蘇武「貴種流離」異地，面臨諸多「限界狀況」，然總是心繫漢室家園，「鄉愁＝NOSTALGIA」之情應運而生。其自始自終所「追尋＝QUEST」的是「『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始於四方，不辱君命』」(漢～2469)的「忠義誠信」之境界。結語中，以「雁」傳書的「權宜計謀」，與作品主題連貫與呼應。

以下將以《平家物語》《今昔物語集》爲探討對象，從「貴種流離譚」及「追尋」的文類出發，以相關主題「忠義誠信」及意象「雁」爲符碼，檢視這兩部日本文學作品中的蘇武形象及其改寫意圖與策略。

三、《平家物語》

敘述源平兩氏對峙的《平家物語》是日本中世紀「軍記物語」的代表作，該作品隨著年代流傳，形成諸多版本，一般認爲覺一本《平家物語》的文藝性較其他版本高，然近年似乎有轉變趨勢。作品文體採用日本中世紀特有的「和漢混交文」(日文與漢文互用的文體)。因此，作品當中浮現很多漢文跡象，其中卷二更以「先例說話」[11]形式，將蘇武故事單獨納入作品，形成〈蘇武〉篇章。然而，隨著版本不同，採用形式與出現位置有異，使得「蘇武說話」的類型增加，故事與文本的張力增強。本研究乃爲日後相關研究奠定基礎，預定以覺一本《平家物語》爲主要探討對象，至於其他版本則留待他日再行研究。

一般而言，日本蘇武故事分爲「舊態蘇武譚」及「新態蘇武譚」。日本學者今成元昭指出古態所呈現的主題是繼承《漢書》以來傳統，將「持節」「辛苦」視爲母題，雁書看作一種「權宜計謀」；而新態蘇武譚則由三卷本《寶物集》作者身旁的僧團，以《琱玉集》作爲基本資料改編而成，將其中「望鄉」「恩愛」作爲母題，視雁書爲「奇跡」。

[11] 「先例說話」，意指作品藉往昔所發生過的歷史故事，將眼前面臨的故事情節加以定位，並予說明。此種類型的故事便作此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家物語》乃承襲新態蘇武譚，而其爲配合日本和歌傳統將結尾部分的「雁首」改爲「雁翅」。再則，佐伯真一則持不同看法，其認爲新態蘇武譚並非將《琱玉集》作爲基本資料進行改編，而是藉由不提舊態「權宜計謀」方式呈現「生離死別」的類似說話。其中，覺一本《平家物語》較傾向於「持節」「功勳」的主題[12]。

本論於第二節當中，曾針對中國《漢書》〈蘇武傳〉所呈現的主題、意象及作者意圖等層面進行探討，結果顯然和前面兩位學者的論述有所交集。然而，爲求呈現實際狀況，以下將透過覺一本《平家物語》〈蘇武〉內容，進行實際的文本分析及討論。覺一本將此篇章安排於〈卒都婆流〉（流版傳書）一章之後，而〈卒都婆流〉內容乃是以謀反平家等人爲敘述對象，敘述其因事跡敗露，被貶至鬼界島時的故事始末，其與〈蘇武〉的關連，將於下列引述會隨機導入。

從〈蘇武〉原文：「以蘇武為大將軍，帶兵 50 萬騎……以蘇武為首，……各砍去一肢腳」的敘述中，令人直接感受到故事人物，無論在頭銜、帶兵人數或其身受劫難的敘述模式均與中國《漢書》〈蘇武傳〉截然不同。同樣的差異實例爲數不少，其中以雁書傳予漢王及關於李陵的敘述較爲凸顯。以下就先針對這兩部分進行分析。

雁書傳來，漢王看完後感嘆地說：

> 「唉！真是可憐，這乃是蘇武的筆跡啊！他還在胡地活著呢？」於是命令李廣帶兵百萬騎前去。這回可是漢兵強盛，終於戰勝了胡國。蘇武聽說本國得勝，乃從曠野爬了出來說道：我就是從前的蘇武呀！」（平～99）[13]

顯然地，此段敘述與原典迥異。其一是出兵與匈奴作戰的敘述。就《漢書》〈蘇武傳〉所提，蘇武得以歸漢乃因昭帝採和親政策及隨從常惠獻計使然，根本未發生任何流血衝突。其二是人物角色張冠李戴，胡亂安排。眾所皆知，李廣乃李陵之祖，於武帝天狩年間引刀自刎，昭帝之時，當已不在人間，又如何帶兵領將？再者，敘述中以漢王的

[12] 梶原正昭編《平家物語必攜》（學燈社、昭和 60 年 11 月）。
[13] （平～98）表示引用自周啓明、申非譯《平家物語》(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感動，呼應平清盛的感動。而清盛對反叛者康賴等人的感動一點，在敘述文本中顯得相當弔詭。《平家物語》在〈蘇武〉章節出現前，曾敘述平清盛將謀反者康賴等人流放異地。此時，對平清盛的人物形塑都採用負面的批評手法。然而，爲求呼應〈蘇武〉內容的〈卒都婆流〉一章，卻出現下列的結語：

> 入道亦非木石，看了康賴所作的和歌，畢竟也起了惻隱之情。（平～97、98）

由此結語可知，作者原本塑造清盛入道的殘暴驕奢形象，似乎已隨著結語：「入道非木石……幸畢竟也起了惻隱之情」及敘述：「入道相國看了康賴刻再板塔上的和歌，動了憐憫之情，因而京都上下，無分老幼，交口傳說鬼界島上流人的和歌」（平～98）而產生流動，且其敘述口吻也較先前委婉。原因之一乃爲呼應卷三〈御產〉所下的伏筆。第三卷〈御產〉敘述平清盛之女貴爲皇后，臨盆之際，清盛入道爲祈求其女生得一子，而特赦康賴等人返回京城以消彌怨靈。基於如此考量，作者預先在卷二結尾部分改變先前一貫立場，以較善意的立場呈現平清盛的人物形象。

接著有關李陵的敘述內容如下：

> 李少卿留在匈奴，不曾回來。無論怎麼請求要回漢朝，胡王總是不許，實在無可奈何。漢王卻不知道這種情形，以為不忠於君，所以將他已死的雙親的屍骸掘了出來，加以鞭打，對於六親也都加以處罰。李少卿聽到這個消息，深為怨恨，但對於故鄉仍然懷念，於是寫了一封書信給漢王，表明自己並非不忠於君。漢王看了說道：「看來是很可憫的了。」對於掘出父母屍骸加以鞭打的事，深覺後悔。（平～99）

由此段引述，依然可見扭曲史實之處。《漢書》記載李陵確實留在匈奴，亦曾有歸漢念頭，然因朝廷施害於其家族，故未曾向單于提出歸漢要求。再則，李少卿並未書函向漢王表白自己的忠心，反而是司馬遷爲其辯護：「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14]，間接引來牢獄之災。

[14] 同注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由前兩段敘述內容的呈現可知，〈蘇武〉一章以幾近離譜的方式，將《漢書》〈蘇武傳〉改寫成脫離史實的風貌。此點當然可以認定〈蘇武〉並非直接襲自原典《漢書》〈李廣蘇建列傳〉。原因在於《平家物語》於流傳與轉介過程中，大多透過失明法師以琵琶伴奏傳誦，而口誦與道聽途說過程中，自然無法避免誤傳或人物情節的張冠李戴。再者，日本中世盛行的四書五經等啓蒙書，或許也是助長文本轉化時的誤差根源。不過，誤差卻是成就文本多樣化的可能。

接著，從蘇武受困場所及生活方式的描述裡，依舊清楚可見其與原典的差異。

> 上山拾樹上的果實，春天採澤裡的芹菜，秋天拾田裡的落穗，藉此維持危淺的生命。田中的雁和蘇武熟稔了，並不懼怕他，蘇武見此情景，心想此等鴻雁往來我的故鄉，不禁動了思鄉之情，於是便寫了一封書信，對鴻雁道：「請把此信帶給漢王吧！」繫在翅膀上放它飛去。（平～98）

這段敘述反映出蘇武立身之地，不但有分明的時序變化及春耕秋收的農村景緻，更是充滿翠綠、珠黃的彩色世界。如此景緻應該異於邊疆塞北的黃沙白雪及了無人跡的世界。再者，鴻雁爲伴，繫帛書於鴻雁翅膀，求其代傳書信，則表露出期盼早日返鄉的心情。而此心情正是「望鄉」的化身，其藉由鴻「雁」明白呈現。此外，「春天採澤裡的芹菜，秋天拾田裡的落穗」中的意象亦是不可忽視。由於「澤」在陰陽五行中表現「水」，「田」表「土」，而「水」喻北，「土」喻南或中，此意象似乎顯現雁的習性：春天北歸，秋天南下過冬。

從上述「望鄉」主題和原典對照發現，《漢書》〈蘇武傳〉僅將「鄉愁」「望鄉」的主題內化於文本中，對於鴻「雁」的敘述表現並未明顯呈現與強調。相反地，《平家物語》〈蘇武〉卻是清楚地將此主題呈現於作品表層，其目的是要藉由這些「望鄉」主題的強調及意象、背景的改寫，直接將鹿谷事件[15]主要人物成經與康賴兩人的望鄉情懷及其

[15] 鹿谷事件即是謀反平氏運動。主要謀反人物有俊寬稱僧都、成親等人。策劃地點即在鹿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在位置襯托出來。而其望鄉之情表露於鬼界島祈求「熊野權現」[16]及藉助〈卒都婆流〉(流版傳書)的敍述上。由此可見，「雁」之於蘇武，猶如「卒都婆」之於康賴。換言之，雁在《平家物語》〈蘇武〉所佔比重之大是肇因於作者有意藉提昇「雁」的角色功能，方便與「卒都婆」比擬，藉由比擬達到強調「望鄉」主題的目的。〈卒都婆流〉敘述康賴因思鄉情切，做出一千根「卒都婆」，上面一一寫著梵文、年月日、官階、姓名及兩首和歌。和歌內容如下：

> 〈寄語海上風，轉知我高堂；兒在薩摩灣，頑健仍如常。〉
>
> 〈遊子暫離去，獨自念故鄉；僻地做逐臣，其情何悲涼。〉(平～96)

兩首和歌不但表現出親情離別之苦，也訴說著逐臣的悲戚無奈，更展現出康賴的思鄉情懷，而此乃呼應望鄉主題的文本策略。

如前所述，《平家物語》透過「雁」和「卒都婆」的前後類比，襯托出望鄉（鄉愁）主題。以下我們將繼續藉用鴻雁的敘述，將作品內的相關主題及意義烘托出，同時也一併探討其與原典的差異情形。

> 到了秋天鴻雁果然如約從北方飛到京城去，漢昭帝那時再上林苑作樂玩遊。時值薄暮，天色陰沈，景色有些悲涼，恰有一行鴻雁飛了過去。其中一隻飛落下來，用嘴將縛在翅膀上的一封信開來，落在地上。上面寫道：「從前被關在岩窟內，經過三年之愁嘆，今又拋于曠野，成為胡地獨足之人，縱使屍骸於胡地，魂則復歸於君側。」自此以後，書信被稱為雁書，或約雁札。」(平～98、99)

上述引文詳述鴻雁傳書的情形，其與《漢書》常惠獻予使者權宜計謀：「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的話語相異。就敘述手法來看，引文中以擬人化手法敘述鴻雁傳書，如此敘述手法並未出現在《漢書》〈蘇武傳〉。而有關帛書繫於雁足改寫成翅膀的原因，依今成元昭先生所提見解，目的是爲配合日本和歌傳統。至於帛書的內

[16] 「熊野權現」中的權現是指，日本的神道原是佛菩薩隨緣應化，臨時顯現在日本的化身。這樣的神佛就融爲一體。所謂「熊野權現」即是日本和歌山縣熊野地方的三所權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容也呈現極大差異，〈蘇武〉中的帛書內容將〈蘇武傳〉中的「貴種流離譚」及「限界狀況」歷程內化其中，強調蘇武經歷過的艱辛困苦及忠君愛國表現。相對地，〈蘇武傳〉中的雁書內容只強調蘇武困頓之處，對於受難歷程並未作詳細敘述，原因是後者較側重「權宜計謀」的主題表現。

從上述呈現的差異可知，《平家物語》〈蘇武〉中確實存在《漢書》〈蘇武傳〉的忠君主題。該主題雖源自〈蘇武傳〉，然卻無法從返鄉情切的康賴敘事章節中探索出。主要原因在於該章節將敘述焦點置於，強調康賴一心返回京城的思鄉情懷及對老母的思念之情，至於對國家朝廷的感懷之念卻未明白顯現。然而，若將探討焦點置於與康賴有關的背後論述的話，或許可探究出與忠君主題相關的語境。換言之，康賴被貶乃因參與謀反平家運動，而此運動源於不滿平家首腦平清盛的專制跋扈與無視天皇的存在。康賴及一些忠君愛國之士，爲求鞏固皇家地位及尊嚴，私下策劃反平家運動的行徑即是忠君主題的表徵。而作者藉「魂則復歸於君處」的描寫，間接導引出忠君主題，目的應該是要爲康賴等人辯證，其採用的手法與班固爲李陵辯護的含蓄、隱喻手法相仿。

綜觀以上討論大約可以掌握《平家物語》〈蘇武〉的作者意圖、文本策略及望鄉、忠君主題。而這些現象是否持續顯現在〈蘇武〉的結語中，由下內容或可略知一二。

> 漢朝的蘇武附書於雁翅以寄故鄉，本朝的康賴則託海浜傳達和歌予故里；在彼為一紙感懷，在此則兩首和歌；在彼為古之盛世，在此則為末世衰微；胡國與鬼界島相隔，時代亦殊，然而風情卻頗相似，這是很可珍重的。」（平～99）

本節開端部分曾提及〈蘇武〉篇章乃屬「先例說話」，此「先例說話」乃藉助往昔歷史事蹟印證眼前作品的敘述情節。例如，康賴等人的遭遇可以和蘇武境遇比擬。然而，往昔古例所呈現的主題或價值觀必然直接影響作者，而其影響並非只是單純地全盤接受，當中必定會做適度的改寫。從結語中發現，作者雖將原典中的所有意象改寫，然其所欲呈現的主題維持不變，當然程度已顯現部分差異。例如，先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討論過的望鄉及忠君主題，在日本〈蘇武〉中所呈現的比重乃是望鄉重於忠君主題；至於中國〈蘇武傳〉中，則因班固修史立場多依儒教思想，而使忠君主題較望鄉主題明顯。

最後，若從〈蘇武傳〉中討論出的「貴種流離譚」及「追尋＝QUEST」等文學概念來檢視〈蘇武〉篇章的話，可以發現〈蘇武〉及與其相關章節的〈卒都婆流〉故事確實顯現出一種「流離譚」的故事型態。然而，其主角人物康賴卻非「貴種」。再者，若將〈卒都婆流〉中的故事視爲一種 QUEST，似乎也不甚恰當，畢竟康賴只於流放之際才形成 QUEST 之型態。況且其 QUEST 的目標並非「忠義誠信」，而是個人的「歸鄉與生命」。

四、《今昔物語集》

《今昔物語集》是日本平安時代末期，大約於十二世紀前半完成的說話集。全集計三十一卷，卷一～五以天竺爲主；卷六～十以震旦爲中心；卷十到卷三十一則以本朝日本爲主。就內容而言，可分爲佛教說話及世俗說話。本次想探討的是卷十第三十話〈漢武帝派遣蘇武走胡塞〉[17]，內容簡譯如下[18]：

> 距今很久以前，漢武帝當朝時，有位名為蘇武之人。
>
> 武帝派其出使胡塞，久去不歸。數年後，有位號稱衛律之人，前去尋找蘇武，適巧碰上一人，衛律便問：蘇武是否在此?此人為隱瞞事實，答曰:「蘇武早已辭世多年！」衛律心知此言非真，故曰：「蘇武未亡故！今秋蘇武將帛書繫於雁足，欲傳送於皇帝，雁飛至王城，將帛書獻予皇上。皇上御覽帛書，得知蘇武至今猶在。因此汝言不足為信。」那人自知理虧，心想無須隱瞞，便曰：「蘇武確實在此」，便讓蘇武與衛律會面。雁足繫雖是衛律謀略，然由於其藉此謀略將蘇武救出，致使世人聽此故事，總會讚賞衛律一番。(今~272、273)

[17] 國東文麿《今昔物語集》(九)(講談社、1984 年 2 月)。
[18] 依據注十七原文，由筆者自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書》中的衛律受單于之命，勸降蘇武，如今卻「主客易位」，前往匈奴找尋蘇武足跡，終於因其機智行雁書權宜之計，使蘇武獲返回漢室，此舉深獲世人讚賞。全篇結構類似《漢書》〈蘇武傳〉後半，昭帝採和親政策，派遣使者前往匈奴求取蘇武歸漢，單于詐稱蘇武已死。此時，常惠夜訪使者，特獻雁書謀略，使得自己和蘇武得以返回漢朝。兩相比對，除探尋目的、謀略及結果相同外，其餘有關人物安排（昭帝＝武帝、使者＝衛律、常惠＝衛律）都與原典相異。一般而言，《今昔物語集》的原典若是來自漢文原典，大多會忠於原典轉譯成和文。然十卷 30 話在人物安排上所顯現的差異，應該與作品的特性探究相關。由於《今昔物語集》屬「說話文學」，作品多採擷自傳說、民間故事，加上該作品爲集體創作，因此在書寫或傳誦過程容易產生誤差。當然，透過已知的故事人物角色更動，製造新鮮感、特異性及珍奇性較易引人注意。[19]

再者，每卷的個別說話看似獨立，然實際卻有連鎖展開的篇章安排。例如，卷十第 30 話和 31 話〈兩國戶挑戰端物語〉的共同主題便是以謀略智取對方，藉此主題達到警世、勸世目的。當中根本看不出蘇武「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的壯烈表現及對君王的忠貞表現，當然也察覺不到鴻雁所代表的「鄉愁」意象。若以前面所提「貴種流離譚」及「追尋＝QUEST」的文類來檢視卷十第 30 話，似乎只有象徵性的「貴種流離譚」及人物追尋的特質而已。

五、結論

經過前面的詮釋與討論可知，《平家物語》〈蘇武〉與《今昔物語集》〈漢武帝派遣蘇武走胡塞〉兩部作品，於轉化過程中都掌握住《漢書》〈蘇武傳〉的重要主題：權宜計謀。再者，兩者皆以「雁」或「雁書」作爲符碼的現象，不但使作品掌握更多樣化的意象，同時也爲配合作品主題及特性，適度調整敘述風貌，間接創造出更多的文本，使文本張力不斷延伸與擴張。例如，《平家物語》爲長篇敘事小說，當然

[19] 參照日本古典文學全集 21《今昔物語集一》（小學館、1971 年 7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品可發揮的餘地較說話文學的《今昔物語集》爲廣。再者，本論於求取「貴種流離譚」及「追尋」文類的試圖上，都因〈蘇武傳〉影響而出現模糊不清的特質，結果無法令人滿意。

另外，以官方立場編修《漢書》的班固，將蘇武的人物造型刻劃得極爲生動，然而在李陵的人物塑造上，卻顯得含蓄與顧忌。此點於第二節中提過，癥結應該是因爲班固鑑於司馬遷爲李陵辯護，遭受牢獄之災，而不敢貿然步上前人後塵的緣故！《平家物語》內容多以負面批評或隱喻方式敘述蠻橫驕奢的平清盛，然而在導入蘇武故事前後，涉及鹿谷事件後半時，竟以善意口吻呈現。其相關理由已於第三節指出，目的是爲卷三〈御產〉預留伏筆。反觀《今昔物語集》卷十第 30 話避重就輕式地將蘇武面對的諸多「限界狀況」的敘述刪除，取而代之的是，採用和親以後的部分作爲轉化內容，其目的是爲配合第 31 話的連鎖展開形式，貫穿謀略智取的作品主題，附帶凸顯智取、巧謀的重要性！

※本文書寫過程承蒙「日本住友財團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日本関連研究助成」提供研究補助，謹陳謝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